

印巴、僧泰的多元衝突分析與方法評議

張 育 錦

(臺灣觀光學院觀光餐飲系講師)

摘要

討論殖民議題時，有學者指出，殖民者利用多族群的對立，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達到殖民目的；也有學者以「雙重使命」的角度，認為殖民者在殖民地不僅從事破壞，也執行建設，不該遺漏或偏頗其中一項。筆者認為，這兩種對殖民政策的分析方式，容易陷入殖民論述中常見的二分法困境，將殖民者採用「分而治之」的策略，認為是殖民者掌握殖民地的族群對立之後的理性計算，或是無法加以治理族群對立而不得不的退讓，而「雙重使命」則可能合理化殖民政策與忽略不同殖民地的特性。因此，本文質疑以「分而治之」與「雙重使命」為架構的殖民議題分析，是否符合當時的殖民脈絡？以及這樣的分析是否能呈現殖民經驗與殖民的治理性？本文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以英國殖民印度與斯里蘭卡為例，於殖民脈絡下，以地緣政治、族群、宗教、空間、語言、階級、全球化資本主義等因素，進行「多元衝突分析」，做為進一步探討殖民的起點。

關鍵詞：殖民主義、多元衝突分析、印度、斯里蘭卡

* * *

壹、南亞的印巴衝突與僧泰衝突

南亞是世界四大文明發祥地之一，西元前 2500 年左右，發展出城市文明。西元前 14 世紀，雅利安人入侵，建立婆羅門教，制定種姓制度。西元前 6 世紀後，反對婆羅門教統治導致內戰頻繁，佛教與耆那教崛起。西元 4 世紀，從婆羅門教轉變的印度教成為主導地位。西元 8 世紀，阿拉伯人入侵帶入伊斯蘭教。從 1498 年葡萄牙人入侵後，西方殖民勢力相繼入侵南亞。1609 年起英國透過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沿海建立據點，1757 年統治印度多數領地，1858 年正式接管印度，印度成為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被稱為「王冠上的明珠」。此外，1796 年東印度公司進入斯里蘭卡沿海地區，

1815 年英國全面接管。從 18 世紀中期到 19 世紀中期，除尼泊爾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外，南亞地區幾乎都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二次大戰後，民族獨立運動興起，英國為維護在南亞的殖民統治，於 1947 年提出「蒙巴頓方案」(Mountbatten Plan)，一方面解決獨立運動的國際壓力，另一方面則試圖延續在殖民地的利益。南亞許多國家獨立後，面臨複雜的政治地理問題，如喀什米爾問題、俾路支斯坦問題、印中邊界問題等。這些問題與各國的民族、教派等矛盾交織在一起，再加上冷戰時期美國、蘇聯在南亞的滲透和爭奪，使南亞處於長期衝突對立。儘管各國不斷進行雙邊談判，許多問題仍未解決，每年皆發生多起衝突造成大量死傷。南亞的區域衝突形式相當多樣，以衝突規模及造成傷亡較嚴重的是國界衝突與國內衝突。

在國界衝突部分，以印度與巴基斯坦的衝突最為顯著。英國依據「蒙巴頓方案」將印度的居民依宗教信仰分割成三種類型：印度聯邦、巴基斯坦以及包括喀什米爾在內的 562 個土邦。英國讓喀什米爾土邦自由決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保持獨立。按照「蒙巴頓方案」以宗教與地理區位為優先的原則：喀什米爾土邦與巴基斯坦相鄰，佔多數的穆斯林居民也主張加入巴基斯坦，然而，信奉印度教的土邦首領則主張加入印度。^①雖然聯合國決議，喀什米爾問題由喀什米爾人民以公民投票決定其歸屬，但印度不願失去具戰略地位的喀什米爾，而堅決反對。^②自 1947 年印巴兩國分治後，為喀什米爾的主權紛爭已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的戰爭，並提升雙方戰備能力到核武對峙的層級。在喀什米爾地區每年仍有 100 餘起小規模衝突，兩國一直處於軍事緊張狀態。

在國內衝突部分，最為激烈的是斯里蘭卡的內戰。自斯里蘭卡獨立後，僧伽羅人從殖民者手中接收政權，為建立國家政權的合法基礎，實施許多以僧伽羅為主的法律與政策，如通過「僧伽羅優勢法」(The Sinhala Only Law)，將僧伽羅語列為唯一官方用語，限制泰米爾人進入高等院校等激烈且歧視的族群政策。^③ Daniel 認為，僧伽羅人對歷史的詮釋顯現出國家暴力，使得族群差異成為致命的族群間暴力，^④引發泰米爾人組成猛虎組織進行軍事行動爭取獨立。^⑤甚至印度多次出兵協助，仍無法終結猛虎組

註① Gyandendra Pandey e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alism in Colonial North Ind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 Dipesh Chakrabarty, "Modernity and Ethnicity in India," in John McGuire, Peter D Reeves and Howard Brasted, eds., *Politics of Violence: From Ayodhya to Behrampada*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p. 207~218.

註② Anand Kashyap, *Anthropology of Indian Tradition* (New Delhi: Vedams eBooks, 1995), p. 18; Biswanath Joardar, *Anthropology in the Making: The Indian Experience* (New Delhi: Inter-India, 2003), pp. 17~22.

註③ Stanley J.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82.

註④ Valentine E. Daniel, *Charred Lullabies: Chapters in an Anthropology of Viol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3~46.

註⑤ Stanley J. Tambiah, *Sri Lanka: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 13~18; Gananath Obeyesekere,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Sri Lanka," *Internationales Asienforum*, Vol. 15, No. 1-2 (Summer 1984), pp. 44~50.

織的游擊戰與炸彈客攻擊模式。自美國 911 事件後，國際社會形成打擊恐怖主義的浪潮，泰米爾猛虎組織為延續組織運作，將獨立的訴求改為區域自治，每年仍然有 100 多起的軍事衝突。2009 年 5 月泰米爾猛虎組織的領袖身亡，政府軍收復東部與北部領地，零星衝突仍傳。

兩種衝突類型的起源與發展的因素相當多元，以下先針對「分而治之」與「雙重使命」兩種分析方式，探討其分析殖民政策的方式是否合宜。

貳、兩種分析方法的困境

有學者認為英國採取「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 的政策，是南亞當代衝突的重要導因。如 Carro 指出，帝國的力量取決於壓迫的當地無力召集抵抗的人，最成功的殖民者善於利用並擴大當地的差異。而英國殖民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鼓勵並引發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的衝突對立，在他們的自相殘殺中成功地統治。^⑥ Metcalf and Metcalf 則以印度的歷史說明英國從殖民開始，便展開對印度內部的宗教差異進行分化的手法，加深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的對立衝突。^⑦ 時宏遠以斯里蘭卡衝突的根源，說明英國透過扶植少數的泰米爾人來制衡多數的僧伽羅人，殖民時期刻意造成的族群對立，導致獨立後，僧伽羅人對泰米爾人展開反撲。^⑧ 易玲以區域政治的角度，分析印度對斯里蘭卡衝突的介入方式，是英國殖民分化政策的翻版。^⑨ 這些學者以下列的現象，說明英國採取「分而治之」政策：當英國面對英屬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英國決定賦予自治權，但並不打算放棄其影響力，於是把英屬印度一分為三；又以孟加拉省太大難以管理為由，劃分成伊斯蘭教徒和印度教徒各占優勢的東巴與西巴。在斯里蘭卡方面，英國為制衡占人口多數的僧伽羅人，從印度引進數十萬的泰米爾人，並且透過英國的支持，泰米爾人很快在各領域居於主導地位，造成兩個族群的緊張關係。因此，這些學者認為「分而治之」政策是殖民者經過理性計算，並且持此一論述的學者傾向以族群及宗教為分析殖民分化政策的類別。

有學者則質疑上述的論述，^⑩ 認為殖民政策所造成的隔閡，應該只是形成衝突的一

註⑥ James P. Carro, *Constantine's Sword: The Church and the Jews-A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1), pp. 81~82.

註⑦ Barbara D. Metcalf and Thomas R. Metcalf, *A Concise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4.

註⑧ 時宏遠，「斯里蘭卡民族衝突的根源發展及前景」，南亞研究季刊（四川），第 2006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61~65。

註⑨ 易玲，「印度 1980 年代的斯里蘭卡政策與泰米爾問題」，南亞研究季刊（四川），第 2006 卷 1 期（2006 年 2 月），頁 93~99。

註⑩ 林承節，殖民主義史：南亞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412~414。王作印，「西方殖民主義雙重使命解讀——馬克思對英國侵略印度問題的分析追思」，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第 23 卷第 3 期（2007 年 6 月），頁 31~34。俞良早，「馬克思主義關於西方列強在東方殖民地雙重使命的理論」，社會科學研究，第 2009 卷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74~79。陸梅，「從印度的變遷看英國殖民統治的雙重歷史使命」，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1 卷第 2 期（2005 年 6 月），頁 95~99。

個面向，必須進一步思考殖民者在執行「分而治之」政策時，是否清楚地意識到可能造成的分化結果而加以利用，或者殖民者只是基於自身的眼前利益，或因殖民者無力處理紛爭，將問題丟給雙方自行處理，或者將問題回歸當地決定是回應與配合當時國際民族獨立運動的最佳選擇。也就是說，殖民者是否清楚地計算各項政策的後果呢？持質疑立場的學者大多引用 Marx 的經典論述做為基礎。

這些學者主張，Marx 把殖民主義視為必要之惡，雖野蠻卻把非西方帶到由西方規畫的現代歷史過程中，這是殖民主義「雙重使命」(Dual Mandate) 的結果。^⑪依此概念推演，採用「分而治之」的分析只凸顯「破壞性使命」，傾向於以道德標準而非歷史標準進行分析，對與之緊密連結的「建設性使命」略而不談。Marx 認為雙重使命是歷史性的辯證，是並存又矛盾的歷程，將殖民與被殖民含納在一起，形成相互存在的狀態，忽略其中之一便是對歷史經驗的漠視。因此，持「雙重使命」立場的學者認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建立議會民主、社會立法、階級平等理念，使封建體制和種姓制度開始瓦解，加上近代教育的開展，引進西方的知識和價值觀，使知識分子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為印度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想文化等領域創造當代的條件。不過，也有學者提出提醒，不能過度擴大解釋建設性來合理化殖民者的傷害，否則反而誤解 Marx 提出雙重使命的理論觀點。^⑫畢竟，Marx 對英國殖民的分析是基於揭發資本主義的擴張與殖民地發展背後所隱藏的剝削與不平等性。因此，筆者認為，「分而治之」的分析缺乏歷史進程的探索，因而忽略破壞性與建設性之間的辯證關係，而「雙重使命」的分析著重於政治經濟取向，缺乏對社會文化其他向度的考量。

此外，筆者認為「分而治之」與「雙重使命」的分析角度，其所持的方法論是相同的，這兩種對殖民政策與衝突的分析都採用二分法思維，對問題的解析只在於回答：殖民政策是殖民者掌握殖民地社會的族群對立特色之後的理性計算，或無法加以治理族群對立而不得不的退讓？再者，這樣的分析過度窄化殖民脈絡，僅關注殖民者的政策，為考量不同殖民地的歷史特性，而且這樣的分析也無法呈現殖民的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 以及衝突的複雜成因。此外，這兩種分析方式集中於相對主義，缺乏當時的殖民脈絡。因此，除「分而治之」與「雙重使命」的分析方法之外，我們必須從其他更多元的角度，依循殖民歷程，以及殖民前與獨立後的歷史脈絡，在兼顧歷史縱深與社會文化廣度的前提下，找尋印巴衝突與僧泰衝突發生與持續的原因以及較為適合的分析方法。

參、南亞區域衝突的多元衝突分析

衝突分析必須同時顧及到許多結構性與歷史性因素，並且衡量不同因素之間的交

註^⑪ Karl Marx,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New York: New York Daily Tribune, 1853), p. 247.

註^⑫ 杭聰，「馬克思雙重使命論新探」，理論月刊，第 2009 卷第 2 期（2009 年 2 月），頁 12~15。

融，因此，本文以人類學的全貌觀（holistic view）的角度，提出具有動態並能連結不同因素的分析概念，筆者稱為「多元衝突分析」（Multiconflict Analysis），^⑬並依南亞區域的共同殖民經驗與全球化歷程，選取地緣政治、族群、宗教、空間、語言、階級、全球化資本主義等面向，試圖將內在與外在、殖民與被殖民、權力與認同、地方與全球、傳統性與現代性等議題進行「多元衝突分析」，儘管這些面向並未涵蓋衝突分析的所有因素，但筆者認為，透過這六個面向的「多元衝突分析」，一方面可以呈現衝突的歷史脈絡與殖民脈絡，另一方面也可以釐清「分而治之」與「雙重使命」分析方法所呈現的限制。^⑭

一、政治地理的衝突

審視印巴衝突時，不能單以英國殖民者的角度出發，認為英國人有意留下國界緊張關係，而忽略印度與巴基斯坦在爭奪喀什米爾時所存在的其他因素，尤其印巴衝突正好歷經冷戰的高峰與終結，涉及複雜的國際政治與區域政治的變化。

冷戰時期，印度支持蘇聯，美國為均衡在南亞的勢力便拉攏巴基斯坦。1962 年中國進攻印度時，美國向印度提供援助，巴基斯坦便和中國成為盟友。70 年代巴基斯坦主動作為美國通向北京的渠道，美國轉向支持巴基斯坦。1974 年印度核武試爆，美國中斷向印度供應核燃料，印度轉為支持蘇聯。巴基斯坦發展核武後，美國也停止經濟和軍事援助。1981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考量到巴基斯坦的戰略位置便解除對巴基斯坦的制裁，並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⑮冷戰結束後，美蘇在南亞的借效能消失，由於印度在南亞的地緣地位突出，美印關係日漸升溫。1998 年印巴在短短幾天內連續進行五次核試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聯手對印巴實施經濟制裁。印度把核武試爆轉嫁到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威脅上，中印關係再次遭受重創，但印度與美國的關係相對得到加強。911 事件後，巴基斯坦在反恐怖中的地位變得重要，美國重修與巴基斯坦的關係。^⑯從國際關係，尤其冷戰的對立架構來看，印巴兩國似乎沒有太多國際政治的選擇性，都擺盪在美國的拉攏與制裁之間相互抵制，但換成區域政治的角度來看，情

註⑬ 多元衝突分析為筆者嘗試提出的新概念，主要以跨學科與多元視野的概念，試圖對以往南亞殖民的分析方式提出另一個途徑。而這樣的方法論意圖是參照 Immanuel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218~226. 在反思社會科學的發展史時，認為社會科學的創新是透過分裂與混交 (fragmentation and hybridization) 的雙重過程。因此，本文試圖提出「多元衝突分析」，以便與「分而治之」、「雙重使命」的分析策略進行方法論的對話，做為對 Wallerstein 論點的理解與實際操作。

註⑭ 本文的問題意識主要是多元衝突與分析方法的評議，並以印巴衝突與僧泰衝突做為分析的案例，並非將兩種衝突當成比較的案例。因此，以下六大面向的分析，主要是以文獻與理論觀點的論述為主，在寫作結構上並不安排兩種衝突的對應性。

註⑮ Subrata K. Mitra, "War and Peace in South Asia a Revisionist View of India-Pakistan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 10, No. 3 (Fall 2001), p. 366.

註⑯ K. M. De Silva, "Ethnicity and Conflict in South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1 (Spring 2001), p. 55.

況便不一樣。

印度擁有的國土面積、人口和文化遺產，連同科技、外交、軍事等方面，在南亞地區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不惜巨資與人力派遣部隊進入協助斯里蘭卡內戰、^㉙發展核武、試驗導彈、強迫不丹與錫金成為「保護國」、要求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皆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野心。相對的，巴基斯坦獨立之初幾乎找不到提供援助盟國，^㉚為了不被印度吞併，巴基斯坦將中東的穆斯林進行連結，透過伊斯蘭教建構成特殊的掩體，^㉛這樣的作法使印度把巴基斯坦視為在南亞的最大威脅。由此可看出巴基斯坦在國家安全與族群及宗教意識中的妥協，也看出印度由被動轉為主動操弄區域政治，更可以看出，印巴衝突是複雜國際關係與區域政治下的縮影。

儘管斯里蘭卡在國際政治與區域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如印度，但同樣地，Krishna 認為斯里蘭卡泰米爾人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必須與僧伽羅人的壓迫適度分開來看，不能單純地將雙方衝突視為族群壓迫與反抗的問題，必須回歸當時全球脈絡下國族主義的興起與擴張進行探索。^㉜因此，上述兩類衝突，無論是衝突的起因與衝突持續的動力，既不是英國殖民時期的政策操弄，也不是刻意分化的結果，而是國際政治與區域政治中印度國族主義擴張與泰米爾獨立運動的結果。

政治衝突不可避免地導向合法性的競爭。^㉝De Silva 等學者關注國家圖像如何導致民族與宗教衝突，認為國家建立政權的合法基礎，提供創造與再生產特殊圖像的基礎。^㉞印度、巴基斯坦與斯里蘭卡的合法性競爭主要便是透過族群與宗教的衝突來呈現。

二、族群與宗教的衝突

區域衝突研究需要重新思考社會文化與暴力的關係，^㉟尤其是透過宗教呈現的衝突，以及被倒置為宗教衝突的族群衝突，^㉟基於族群與宗教的複雜關係，本文將兩者併置討論，以釐清在南亞衝突的歷史脈絡。

依歷史發展，喀什米爾歸屬問題與泰米爾獨立問題，是英國殖民政權撤出南亞後

註^㉙ Jeremy Armon and Liz Philipson eds., *Demanding Sacrifice: War and Negotiation in Sri Lanka* (London: Conciliation Resources Lancaster House, 1999), pp. 2~28.

註^㉚ Keith Callard, *Pakistan: A Political Stud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7), p. 303.

註^㉛ Wilfred C. Smith, *Islam in Modern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19; S. Siddiqi, "Chemistry," in M.M.Sharif, ed., *A History of Muslim Philosophy Vol.2*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6), p. 17.

註^㉜ Sankaran Krishna, *Postcolonial Insecurities: India, Sri Lanka,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hoo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 71.

註^㉞ Subrata K. Mitra and Dietmar Rothermund eds.,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Manohar, 1997), pp. 15~16.

註^㉟ K. M. De Silva, Pensri Duke, Ellen S. Goldberg, and Nathan Katz eds., *Ethnic Conflict in Buddhist Societies: Sri Lanka, Thailand, Burma* (Colombo: Westview Press, 1988), pp. 62~72.

註^㉟ Peter Pels, "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Governmentality," *Annual Review Anthropology*, Vol. 26 (Spring 1997), p. 170.

註^㉟ Metcalf and Metcalf, *A Concise History of India*, p. 316.

才發生。然而，殖民留下的國界爭執與政權移交方式只是導因，族群與宗教才是開啓與延續衝突的重要因素。南亞地區的宗教衝突有著深層的歷史糾結，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相互迫害的歷史、教徒間的宗教流血暴力事件，凸顯的是兩個宗教之間的矛盾情結。同樣的，斯里蘭卡的內戰雖是泰米爾人爭取獨立的軍事行動，但佛教與印度教的長期衝突更是重要因素。

在印度教與伊斯蘭教間延續數百年的宗教衝突背景下，加上印度教徒從未將穆斯林納入種姓階序，甚至認為穆斯林只是「化外之民」(mlecchas)。^㉙相對的，穆斯林拒絕承認婆羅門的至高地位，而無法被印度教徒接納其為刹帝利。^㉚在此架構下無法容納對方，這種有意識的區隔，成為雙方衝突對立的來源。Dumont 引述 Beni Prasad 的觀察，指出英國殖民勢力進入南亞後，穆斯林中產階級的地位不僅被印度教徒所取代，也被英國殖民者視為舊政權反動的代表，^㉛這種處境加深人口數相對較少的穆斯林的危機感。Dumont 認為，由於現代「民族」觀念的影響，使得「領土」成為民族的必備要素，若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就必須走上印巴分離的道路。^㉜

當然，英國人入侵印度之初，打擊重點是穆斯林貴族和封建主，他們因喪失政權而有強烈的反英情緒。到了 19 世紀末，民族運動的領導者和參加者主要是印度教徒。英國人改拉攏穆斯林，打擊印度教徒的策略。^㉖從這個過程來看，英國確實採取因應統治需要的分化與拉攏手法，加深雙方的對立與衝突。但，若回到印巴的族群與宗教問題的歷史脈絡來看，百年延續下來的對立與衝突，並未受到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所影響，因此，從深遠的歷史脈絡，不能將當代的衝突因素直接歸因給殖民的分化政策。尤其，從近來的宗教紛爭或印度人民黨的民族主義引發的南亞緊張局勢看來，似乎族群與宗教的因素大於殖民政策的影響。

在斯里蘭卡方面，英國殖民期間泰米爾人知識水準比僧伽羅人高，再加上泰米爾人善於經商，很受殖民者器重，在政治和經濟上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1949 年獨立後，僧伽羅人因人口占多數，接收較多英國殖民留下的資源，並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階層逐漸占有優勢地位，^㉗開始對過去享有政治資源，又屬少數的泰米爾人採取許多不平等政策，並剝奪他們原本在政治和經濟上擁有的勢力。

從歷史來看，英國人重用教育程度較高的泰米爾人，儘管有分化策略的意涵，造成族群敵對，卻有其殖民需要的考量，因為依據當時英國對斯里蘭卡的殖民統治狀況，根本不需要拉攏任何民族。至於獨立後，僧伽羅人在立法、語言、教育等方面對

註㉙ Peter Van der Veer, *Religious Na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43~144.

註㉚ Dumont,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p. 320.

註㉛ Ibid., p. 318.

註㉜ Ibid., pp. 330~334.

註㉖ John Darwin, *Britain and Decolonisation: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 War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88), pp. 122~131.

註㉗ Bruce Kapferer, *Legends of People, Myths of State: Violence, Intoleran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ri Lanka and Australia*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8), pp. 1~26.

泰米爾人的不平等措施，可視為兩個族群在殖民前的矛盾，進一步的發酵；也可視為獨立初期，泰米爾人試圖透過族群意識加強團結，以取得國家領導權的努力。

因此，喀什米爾歸屬問題與泰米爾人獨立問題，主要是源自族群與宗教在歷史上衝突累積。既存的族群與宗教問題不一定全是殖民政策造成的後果，反倒是必須注意族群與宗教因素發揮的作用。

依佛教的教義與規範，佛教徒不能毀謗與歧視，但斯里蘭卡族群衝突顯然出自於佛教徒。^㉙西方認為佛教是與日常生活政治與社會事務分離，強調非暴力的宗教應該避免捲入政治暴力，Tambiah 認為這樣的看法忽略社會存在與實踐的結構與關係。^㉚具民族主義的僧伽羅佛教徒認為，民族與國家是一體的，個人的整合有賴於這種包容性，因此，國家的分裂就是民族的分裂，也是個人的分裂。雖然國家的觀念包括非僧伽羅佛教徒的人民和民族，關鍵在於，這些人民要保持對僧伽羅佛教的等級性服從。^㉛ Tambiah 檢視佛教僧侶的積極活動不僅擴展或重振他們的傳統角色，也產生與形塑在現代國家中的政治動力。^㉜因此，在斯里蘭卡的歷史脈絡中，政治與宗教兩個範疇之間，不僅沒有明顯界線，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指涉相同事務。這種發展經驗相對於世俗主義政教分離原則來說，不僅恰恰相反，更是讓深受個人主義思維影響的西方殖民者難以理解。^㉝因此，Manogaran and Pfaffenberger 指出，認同才是主因，宗教只是一個被操作的媒介。^㉞在審視衝突時，族群與宗教因素不能視為被殖民政策所操弄的意識形態，必須意識到族群與宗教是源自內在深層的認同需求。

斯里蘭卡獨立後，僧伽羅人對歷史的重新建構中，刻意將泰米爾人當成移民與外國人，這樣的區隔不僅發生在族群與宗教，更透過空間與區域意識使衝突點更廣泛地擴散開來。

三、政治空間的衝突

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分布於島嶼的中部、西南和東南部，是西南季風挾帶豐富雨量的濕區，泰米爾人分布於島嶼北部與東部，僅有東北季風和偶爾的冬季颱風提供少量降雨的乾區，這種天然區域差異使得雙方的耕種與文化有所不同。^㉘雙方幾世紀以來

註㉙ De Silva et al., *Ethnic Conflict in Buddhist Societies: Sri Lanka, Thailand, Burma*, p. 202.

註㉚ Stanley J. Tambiah, *Buddhism Betrayed?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Sri Lank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173.

註㉛ Kapferer, *Legends of People, Myths of State: Violence, Intoleran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ri Lanka and Australia*, p. 84.

註㉜ Tambiah, *Buddhism Betrayed?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Sri Lanka*, pp. 80~94.

註㉝ Rahula Walpola, *The Heritage of the Bhikku: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hikkhu in Educational,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4), pp. 68~69.

註㉞ Chelvadurai Manogaran and Bryan Pfaffenberger, *The Sri Lankan Tamil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Colombo: Westview Press, 1994), p. 116.

註㉟ Patrick Peebles, "Coloniz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the Dry Zone of Sri Lank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1 (Spring 1990), pp. 30~32.

被熱帶叢林分隔，直到 1833 年英國將它們整合在單一中央政府下統治，^㉙讓空間問題浮現。傳統斯里蘭卡的歷代政權都必須透過位於康提（Kandy）的佛牙寺賦予權力，才能取得政權的正當性。英國殖民初期，為取得統治的正當性，並瓦解傳統透過宗教賦予權力的形式，將首都改至可倫坡，以剝奪康提的空間地位，^㉚並將可倫坡建構成現代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㉛瓦解原有的空間權力分配。

Tambiah 認為，相較於透過首都遷移，削弱康提的政治空間意涵，相對帶來更大衝擊的，應該是獨立後，以僧伽羅人為主導的人口遷移政策所引發的族群對立與暴力。^㉜1970 年代，僧伽羅人透過「農業拓殖與正式再定居計畫」將僧伽羅人的農夫遷移到泰米爾人的生活領域，除土地資源競爭外，也加深族群區隔的介面、^㉝擴大族群衝突區域、激化傳統泰米爾故鄉（Traditional Tamil Homeland）觀念。^㉞這種農業殖民政策，可視為僧伽羅人對泰米爾人進行內部殖民主義的形態。^㉟在印度方面，儘管 Pandey 認為英國殖民政策導致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自治分立與地方自治主義的建構，^㉟但是，透過喀什米爾歸屬的過程，可以進一步釐清空間與政治之間的關聯。當初英國賦予喀什米爾內的 562 個土邦可以自由選擇歸附印度或巴基斯坦，大多數土邦內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民居多，他們主張加入巴基斯坦，但是土邦的領導人大多數信仰印度教，則執意加入印度，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穆斯林處於被壓迫的無權地位，才是空間政治衝突的主要因。相較之下，殖民者將不同族群合併同一個國家的政治空間或首都遷移的政策，並不是那麼具有空間衝突的延伸性。

Manogaran and Pfaffenberger 認為民族認同應該是對文化特徵進行有意識的選擇，使得該特徵在當時，無論是真實或想像上都成為社群成員的象徵。在現代西方意識下，語言的象徵性經常成為民族認同的標的。^㉟因此，對衝突的分析也必須考量語言因素。

註㉙ A. Jeyaratnam Wilson, *Sri Lanka Tamil Nationalism: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 14.

註㉚ A. Jeyaratnam Wilson, *The Break-Up of Sri Lanka: The Sinhalese-Tamil Conflic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 15.

註㉛ Nihal Perera, *Society and Space: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Postcolonial Identity in Sri Lanka* (Colombo: Westview Press, 1998), p. 185.

註㉜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 86.

註㉝ Peebles, *Coloniz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the Dry Zone of Sri Lanka*, pp. 37~38.

註㉞ Peebles, *Coloniz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the Dry Zone of Sri Lanka*, pp. 37~40;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p. 82~94.

註㉟ Manogaran and Pfaffenberger, *The Sri Lankan Tamil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p. 11.

註㉟ Pandey,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alism in Colonial North India*, p. 60.

註㉛ Manogaran and Pfaffenberger, *The Sri Lankan Tamil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p. 133.

四、語言政策引發的衝突^①

語言是簡便的辨識項目，族群常使用語言來象徵其族群認同與排他性。^②當權力競爭越激烈，問題越複雜時，語言便是最方便的衝突象徵。^③因此，許多學者依據「分而治之」分析斯里蘭卡的國內衝突時，將1956年的「僧伽羅優勢法」中，把僧伽羅語列為唯一官方用語的措施，視為僧伽羅人與泰米爾人雙方衝突的直接導因。這樣的分析方法不僅簡單化衝突起因，並且也將語言與政治的關聯性單一化。儘管僧伽羅優勢法被認知為語言歧視主義，但雙方關心的重點似乎不是語言。不少語言學家以跨國界研究，驗證語言的多樣化與政治的關係，發現語言的多樣化不必然導致政治衝突。^④

更何況，泰米爾人的抗爭並非針對語言人權，也不是擔心語言滅絕的威脅，也非要求政府平等、公正的對待弱勢語言。甚至，當政府通過將泰米爾語提升為國訂語言並隨後進行立法，也不能阻止泰米爾人的抗爭。因為，語言忠誠被選擇性地歸到族群忠誠中加以政治化。^⑤語言能力影響到政治權力、經濟資源以及社會地位的分配，所以，語言是政治力的展現，也是用來表達政治訴求的工具。^⑥

Laitin 認為，語言衝突不是宗教或文化衝突的殘餘，語言有自己的特殊動力。單單對語言政策的不滿可能無法成為族群暴力的導火線，但是若與其他因素連結的話，便可能產生暴力。^⑦

Anderson 認為，殖民政府基於統治需求，透過殖民教育傳播及強制政策，培植一批能夠通曉雙語的地方菁英。^⑧相較於單一語言的人權問題，使用雙語的菁英對於衝突

註^① 在印巴國界衝突中，語言因素並不明顯，依據註^⑩的寫作說明，故本節不提出對印巴的分析。

註^② Cheng-Feng Shih, "The Emergence of Basque Nationalism in Spain: An Examination of Some Explanatory Variables,"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Fall 1995), p. 17.

註^③ Inglehart and Woodward, *Language Conflicts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pp. 36~37; T. Skutnabb-Kangas and R. Phillipson,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Past and Present," in T. Skutnabb-Kangas and R. Phillipson, eds.,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Overcoming Linguistic Discrimin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4), pp. 6~7.

註^④ Joshua A. Fishman and Frank R. Solano, "Cross-Polity Perspective on the Importance of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as a Contributory Factor in Civil Strife," *Canadian Revie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 Vol. 17, No. 1-2 (1990), pp. 131~146; Ronald F. Inglehart and Margaret Woodward, "Language Conflicts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0, No. 1 (Spring 1967), pp. 28~29.

註^⑤ Juyotirindra Das Gupta, "Language Diversit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Fishman Ferguson and Das Gupta, eds., *Languag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Nations* (New York: Wiley, 1968), p. 23; Chris Kennedy ed.,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duc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3), p. 1.

註^⑥ W. O'Barr,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Policy in Tanzania: an Overview," in W. O'Barr and J. O'Barr, eds., *Language and Politics* (The Hague: Mouton, 1976), pp. 5~10, 21.

註^⑦ David D. Laitin, "Language Conflict and Violence or the Straw that Strengthened the Camel's Back," Presented for Language Conflict and Violence (Madrid: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uan March Institute, April 15, 1999), p. 2, 12.

註^⑧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83), p. 115.

的影響更為直接。

五、社會階級與政治菁英

後殖民論述的學者指出，殖民主義造就一群新本土菁英階級，殖民化的任務也因這個階級與殖民者的合作，變得更為容易。⁵⁵獨立之後，這樣的情況並未改變，Tambiah 認為，南亞的民族性政治是資本主義以及由菁英所掌握的國家機器所交織與衝突的產物。⁵⁶印度與斯里蘭卡的新本土菁英雖以反抗殖民統治為前提，卻繼承英國殖民的統治方式，接受英國的價值觀，模仿西方建構一致化的國家認同，階級利益成為政治的首要目標。⁵⁷因此，Mehta 認為族群暴力只是階級暴力的偽裝，是中產階級與新本土菁英階級使用的工具。⁵⁸

新本土菁英夾處於殖民與當地文化之間的尷尬，一方面是殖民者下屬，另一方面又統治底層，儘管角色尷尬，卻也衝擊原有的社會階級化的制度。⁵⁹加上殖民經濟與政治的介入，更使當地穩定的社會階層與種姓階級受到挑戰，如殖民統治使較低的種姓階級被邊緣化，⁶⁰不分階級加入戰爭，產生種姓階級之間的緊張與改變。⁶¹因此，Wilson 認為獨立的斯里蘭卡是災難的開始，原因不是多族群共存，而是具壓抑與非民主的行政結構被設計來壓制區域性權威。這套英國設計來對付康提領袖的系統，經僧伽羅人稍微修正後用來壓制泰米爾人，結果得到自由的並非泰米爾人也非僧伽羅人，而是壓制與民族中心的政體。⁶²從政治菁英的角度確實看到殖民政策的立即與後續影響，但是並不能擴大為或視為分化政策的延伸，必須將分析架構擴大到全球層次來理解。

六、全球化經濟系統引發的衝突

許多學者不再集中於處理衝突點，而是將觀察架構放大到全球化與殖民主義的角

註⁵⁵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 43; Arif Dirlik, “Rethinking Colonialism: Globaliz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Nation,”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4, No. 3 (Fall 2002), p. 431.

註⁵⁶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 9.

註⁵⁷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p. 23~24; Kapferer, *Legends of People, Myths of State: Violence, Intoleran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ri Lanka and Australia*, p. 84; Krishna, *Postcolonial Insecurities: India, Sri Lanka,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hood*, p. 71; Mathur,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South Asia Rethinking the Archive*, p. 95.

註⁵⁸ Pratap Bhanu Mehta,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acific Affairs*, Vol. 71, No. 3 (Fall 1998), p. 377.

註⁵⁹ T. Luhrmann, *The Good Parsi: the Fate of a Colonial Elite in a Postcolonial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6; Mathur,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South Asia Rethinking the Archive*, p. 95.

註⁶⁰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 53.

註⁶¹ Manogaran and Pfaffenberger, *The Sri Lankan Tamil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p. 116.

註⁶² Wilson, *The Break-Up of Sri Lanka: The Sinhalese-Tamil Conflict*, p. 168.

度來重新審視衝突問題。例如 Wickremeratne 強調，殖民地只是英國所需原物料的供應者，殖民措施如種植園經濟帶來的影響，對獨立後的經濟發展並無幫助。⁶³ Daniel 則反駁這種過度狹隘的分析，改採取殖民主義本質的角度，認為斯里蘭卡獨立後，殖民主義者把殖民主義轉化出新的經濟形式，以彌補殖民主義的空缺，企圖對獲得政治獨立的國家繼續控制、干涉與掠奪，讓這些國家對原先殖民國的依附性，維持國際不平等關係和國際經濟秩序。⁶⁴相對於，這些以殖民者為主體，討論殖民主義是否成功或是否延續的問題，Somasundaram 則跳脫出以殖民為主的思考模式，認為比衝突帶來更大傷害的是，傳統的泰米爾文化被西方文化取代，難民四處離散，國家被暴力對峙所耗盡，並且被粗暴地吸納進全球化政治經濟體系的過程。⁶⁵

目前印巴衝突或僧泰衝突都邁向和談歷程，因為雙方都考量到衝突對經濟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⁶⁶因為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如果沒有迎頭趕上，勢必無法繼續與對方長久抗衡。也因過高的軍事預算排擠其他產業與經濟活動的空間，衝突雙方就在一方減少軍事預算，另一方也跟進的情況下，形成刪減軍事預算的循環。再者，觀光收益在國民生產毛額中的比例逐年提升，積極展開雙邊會談，可以向國際媒體散布和平的氣氛以吸引觀光客，增加外匯收入。但是，如果全球經濟因素如此重要的話，為什麼早期聯合國與美國透過經濟制裁的手段，卻無法改善印巴衝突或僧泰衝突呢？原因在於，當時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尚未完全掌握南亞的經濟，僅停留在殖民者所遺留下的經濟生產模式與生產關係，且未對地方的多樣性資源進行多方位的利用。因此，無法讓當時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改變對衝突的論述方式。最後，邁向和談的另一個因素是菁英政治的因素，因為面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使得政治菁英不得不從族群議題轉向經濟議題，以維繫其政治前途與階級利益。

透過上述分析，對南亞的衝突有更明確的歷史架構後，發現殖民所帶進的制度，在殖民主義崩潰後，迅速由更為全面性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進行更徹底的統治，⁶⁷不平等與不公平的殖民化現象仍然存在，只是殖民主義的狀態逐漸消失。因此，對殖民的認識必須延伸到更廣的領域，尤其是日常生活中殖民與權力的關係，才能在殖民脈絡下關照到衝突的意涵。這些方面的研究，已成為南亞研究的重要趨勢之一，如 Spencer 以斯里蘭卡南方小村落 Tenna 為例，說明僧伽羅的佛教徒在當地透過寺廟與僧侶所形構出來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Spencer 關注到地方上小單位的政治意識與族群意識的形塑

註⁶³ Ananda Wickremeratne,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Sri Lanka* (Colombo: Karunaratne and Sons, 1995), p. 275.

註⁶⁴ Daniel, *Charred Lullabies: Chapters in an Anthropology of Violence*, pp. 43~71.

註⁶⁵ Daya Somasundaram, *Scarred Minds: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War on Sri Lankan Tamil* (New Delhi: Sage, 1998), p. 306.

註⁶⁶ J. N. Richardson and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Measur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Sri Lanka's Ethnic Conflicts," in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and Reid Coughlin, eds., *Economic Dimensions of Ethnic Conflict* (London: Francis Pinter, 1991), pp. 194~223;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On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0, No. 4 (Winter 1998), pp. 63~573.

註⁶⁷ Linda K. Richter, *The Politics of Tourism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 156.

如何在個人層次上的運作，而不是以政治或政策來一致化人們的單一認同目標。^⑩又如 Winslow and Woost 則選擇可倫坡的底層階級社區以及成衣工廠女工，透過這些因為戰爭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所產生的新社會階層，呈現戰爭以及伴隨的社會文化變遷對個人的影響。^⑪這些研究除了釐清殖民政策與殖民的後續影響之外，透過個人的認同與情感面著手，更能細膩地對殖民有進一步的反思空間。

肆、對殖民議題分析的反思

對殖民的研究，大致上以 10 年為一個明顯的趨勢；1960 年代，把殖民主義當成對抗與協商的形式，將研究焦點擺在衝突面與國際政治下的和談機制。^⑫ 1970 年代，除了對殖民統治與合理化產生興趣外，^⑬也發展出批判取向，對殖民統治的知識本質產生質疑。^⑭ 1980 年代，以系統化、總體性將殖民主義視為一種制度的探討方式已經消退，轉而把殖民主義當成文化進行分析，呈現殖民主義的偶發性和差異性。^⑮ 1990 年代以後，文本策略的殖民論述逐漸被深入當地殖民文獻與當地實踐的脈絡化所取代，^⑯殖民主義重新定調為經驗的研究形式，^⑰並以民族誌的方式聚焦於現在與過去發展的連續性。^⑱ 2000 年代以後，對於殖民主義的分析逐漸強調社會實踐與非語言傳達的取

註^⑩ Jonathan Spencer, *A Sinhala Village In a Time of Trouble: Politics and Change in Rural Sri Lanka* (New Delhi: Oxford India Paperbacks, 1990), p. 161.

註^⑪ Deborah Winslow and Michael D. Woost, *Economy Culture and Civil War in Sri Lank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10.

註^⑫ Kathleen Gough, "Anthropology: Child of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19, No. 11 (1968), pp.12~27.

註^⑬ Peter Pels, "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Governmentality," *Annual Review Anthropology*, Vol. 26 (1997), pp. 163~166.

註^⑭ Talal Asa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London: Ithaca Press, 1973), pp.18~19; Dell H. Hymes,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Vintage, 1974), pp. 49~50.

註^⑮ Nicholas B. Dirks, "Annals of the Archive: Ethnographic Notes on the Sources of History," in B.K. Axel, ed., *From the Margin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Futur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32.

註^⑯ Nicholas B. Dirks, "Colonial Histories and Native Informants: Biography of an Archive," in van deer Veer,ed.,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3), pp. 284~286; Ann L. Stoler, "In cold blood: Hierarchies of Credi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 Narratives," *Representations*, Vol. 37 (1992), pp. 151~189; Peter Pels and Oscar Salemink eds., *Five Theses on Ethnography as Colonial Practic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VIII, 1~4 (1994), pp. 1~34; George W. Stocking, *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pp. 243~284; Michael Taussig, *The Nervous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

註^⑰ Bernard S.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6), pp. 4~5.

註^⑱ Peter Pels, *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Governmentality*, p. 178.

向；如物件的交易、服飾與建築的安置與性格、農業工具的實際使用、醫療與宗教的表現、家務與親屬的制度、身體規訓、地景的建構等，^⑦強調殖民知識和權力的執行與日常運作，並且把殖民主義當成一個控制的文化計畫。

以殖民研究的發展脈絡來看，以「分而治之」或「雙重使命」為主的論述，是1960年代的學術思維，除了關注的焦點過於擴大衝突的面向之外，並將衝突原因歸為殖民主義，除了忽略長期累積的衝突因子外，更忽略許多國家曾受多國殖民或多次殖民的歷程，局限在殖民末期及殖民最後階段的政策影響的分析，更呈現出狹隘的歷史觀。

狹隘歷史觀的殖民研究，常會引用同樣經歷英國殖民的國家來印證「分而治之」的分析，如北愛爾蘭、馬來西亞的狀況與印度及斯里蘭卡相似，都在獨立後，飽受族群與宗教衝突的痛苦，^⑧甚至辛巴威、肯亞、蘇丹、烏干達、伊拉克、蓋亞那和斐濟也面臨類似的處境。但是，如果僅針對獨立後的衝突現象，而未區分這些國家獨立歷程的差異，以及原本便存在於族群與宗教的歷史衝突，便容易將衝突歸因於殖民政策所造成。

為了避免因狹隘的歷史觀，陷入以「分而治之」與「雙重重務」為分析策略的殖民研究，本文使用「多元衝突分析」，將分析的對象聚焦在殖民經驗與歷史脈絡，並且將治理性視為理解殖民經驗與殖民歷史相互連結的關鍵。

將殖民議題的分析轉移到日常生活的實踐，其關注的焦點便是殖民經驗。透過殖民經驗的研究才能在歷史因素與當代因素之間，建構較為完整的衝突分析，因為殖民經驗來自於殖民主義、國家發展主義、資本主義等結構性因素，包含現代化引進的歷史過程，並非殖民主義單一的影響。再者，殖民主義並非一致的統治技術，透過殖民經驗才能落實當地的脈絡進行探討。此外，殖民經驗具有連續性、累積性，對於評估殖民的影響也較為切當。許多殖民的經典研究分析的正是殖民經驗，如 Dirlik 認為殖民主義並沒有真正消失，僅僅逐漸減弱，Dirlik 對殖民主義的意涵是以殖民經驗的方式來詮釋。^⑨又如 Fanon 所描述的被殖民狀態，指涉的正是殖民經驗。而後殖民論述強調的去殖民，更是去殖民經驗而非去殖民主義，因為要擺脫的是殖民經驗所產生的困

註⑦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19th Century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16~158.; Bernard S.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pp. 164~169; James A. Mangan, *The Games Ethic and Imperialism: Aspects of the Diffusion of an Ideal* (New York: Viking, 1986), pp. 122~141; Peter Pels, "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Governmentality," *Annual Review Anthropology*, Vol. 26 (1997), p. 83, 163; Lynette Schumaker, "A Tent With a View: Colonial Officers,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eld in Northern Rhodesia, 1937-1960," *Osiris*, No. 11 (1996), pp. 237~259; Ann L. Stoler, *Race and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18; Megan Vaughan, *Curing their Ills. 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11~12.

註⑧ Metcalf and Metcalf, *A Concise History of India*, p. 316.

註⑨ Dirlik, *Rethinking Colonialism: Globaliz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Nation*, p. 434.

境。^⑩

有鑑於過往研究經常忽略殖民經驗與歷史脈絡，Daniel 強調對殖民的認識，必須轉向到歷史理論加以解釋。^⑪ Tambiah 以歷史觀點，分析 1983 年泰米爾人與僧伽羅人的衝突，揭示僧伽羅國族主義者的佛教意識形態，以及政治上的應用。^⑫ Tambiah 也以比較觀點，針對南亞不同地點的衝突現象，探討歷史脈絡下，南亞民族國家文化與政治的關係。^⑬ 這兩個研究揭示以歷史觀處理殖民經驗的典範，無論從單一國家或從區域，Tambiah 清楚地掌握殖民經驗在英國不同殖民地之間的差異，在國家獨立後共同面臨的政治衝突下，呈現各國不同的政治因應方式。

許多學者注意到治理性是理解殖民經驗與殖民歷史相互連結的關鍵。^⑭ 例如 Chakrabarty 提到，英國引進現代國家的體制與方法來管理印度，這套系統所帶來的階級區隔遠大於傳統宗教與種姓制度。^⑮ 柯志明透過日本殖民台灣的「米糖相剋」研究提問，殖民者是否需要顧及被殖民者的反應，而這種顧及是否處於經濟學上或政治統治上的最大效益，或者是一種與當地的妥協。^⑯ 也就是說，殖民是否是一套精緻的治理性。

殖民是否為一套精緻的治理性，Darwin 認為，英國殖民政策的最後階段經常會做好準備，確認新興國家在獨立後將會成為英國有用且穩定的伙伴。^⑰ White 則舉出英國在馬來西亞獨立後，仍占有且享有經濟上的強制性優勢，說明英國殖民治理性的深思熟慮。^⑱ 又如甘地的例子，英國人對付民族主義者的策略是，以懷柔或漠視的方法對付民族主義者中的溫和派，對革命的恐怖分子則抓進監牢，但是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是種創新的緩衝法，英國人一開始不知該如何回應。最後，英國人被迫採取更複雜且更精緻的謀略，認為要溫和地對待甘地，不能讓他成為印度人眼中的殉道者。^⑲ 因此，Cohn 認為，印度的統治是知識的統治。^⑳ Tambiah 也認為，英國殖民統治具有精練的

註^⑩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by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Perss, 1967), p. 25.

註^⑪ Daniel, *Charred Lullabies: Chapters in an Anthropology of Violence*, p. 70.

註^⑫ Tambiah, *Sri Lanka: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pp. 16~19.

註^⑬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p. 221~243.

註^⑭ Bernard S.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5; Nicholas B. Dirks, "Ritual and Resistance: Subversion as a Social Fact," in Nicholas B. Dirks et al., eds., *Culture/Power/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83~503; Mathur,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South Asia Rethinking the Archive*, p. 95.

註^⑮ Chakrabarty, *Modernity and Ethnicity in India*, pp. 140~152.

註^⑯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89~195 。

註^⑰ Darwin, *Britain and Decolonisation: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 War World*, pp. 298~299.

註^⑱ Nicholas J. White, *British Business in Post-Colonial Malaysia, 1957-70 Neo-Colonialism or Disengag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p. 3.

註^⑲ Metcalf and Metcalf, *A Concise History of India*, pp. 226~227.

註^⑳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p. 16.

帝國之眼以評估政策的代價與利益。^①也就是說，英國是擅於計算的殖民者，不只在南亞，也在其他地區的殖民歷程中，獲得更為精細的殖民技術。

為使治理性呈現權力與知識的歷史複雜性，Foucault 將權力與治理性的關係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可觀察的項目，發現治理性利用政治經濟作為主要的知識媒介，治安機構則是推行過程中的技術工具。^②已有許多針對殖民技術的研究，擴展這樣的研究範疇：如政府對人口與經濟的概念成為殖民的前驅，^③人口普查與統計對建立殖民與治理性的重要性。^④ Cohn 引用人口普查客體化的過程，^⑤以及 Guha 恢復農民與農民暴動史，研究殖民官僚體制的模式。^⑥ Dirks 追蹤「檔案的傳記」呈現 19 世紀南亞殖民知識的發展。^⑦ Cohn 更將研究延伸到許多不同的場所，包括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品以及布料與服飾的歷史。^⑧類似的研究還包括：公共衛生的出現、^⑨殖民地圖的製作、^⑩殖民稅收與鄉村農業社會等。^⑪雖然研究範圍和意圖有所不同，這些學者共通的是，在殖民檔案中，透過官方知識的產生過程，分析權力的滲透性。^⑫因此，治理性應該被理解為透過社會主體的權力散播，不能視為單一的殖民策略，不僅需要涵蓋殖民技術的掌控，也必須包括這些政策的適當性、運用性和可取性。^⑬

註①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 43.

註② 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in G. Burchell, C. Gordon and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87~104.

註③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114~135; Ian Hacking,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5.

註④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pp. 163~180; Bernard S. Cohn,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42~249.

註⑤ Cohn,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pp. 224~254.

註⑥ Ranajit Guha,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9, pp. 143~146.

註⑦ Dirks, *Colonial Histories and Native Informants: Biography of an Archive*, p. 284.

註⑧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pp. 76~105.

註⑨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19th Century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64~195; Nicholas Thomas,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237~255.

註⑩ Jonh K. Noyes, *Colonial Space. Spatiality in the Discourse of German South West Africa, 1884-1914* (Chur, Reading: Harwood, 1992), p. 222.

註⑪ Clive Dewey, "Images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a Study in Anglo-Indian Thought,"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6, No. 3 (1972), pp. 291~328.

註⑫ Mathur,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South Asia Rethinking the Archive*, pp. 95~96.

註⑬ Pels, *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Governmentality*, p. 176.

伍、結論

在殖民體制中，涉及族群與宗教議題的政策，易被指為具有「分而治之」的政策陰謀，試圖拉攏其中一方以打擊另一方，或分化衝突的兩方便矛盾擴大，殖民者便可坐收其利。這種套套邏輯一再地演練，任何殖民兩個族群以上的殖民者都是「分而治之」的謀略應用者。而「雙重使命」的論述則陷入模稜兩可的相對主義，在「破壞性使命」與「建設性使命」的二分法之間反覆論證，反而無法對殖民政策有更為歷史脈絡的分析，同時也過度簡化殖民歷程中權力運作的複雜性。因此，「分而治之」與「雙重使命」的分析對殖民的認識落入二分法的演繹中，無法看到殖民的豐富面貌，更無法解析衝突的相關問題。

為了克服「分而治之」與「雙重使命」的分析方法，容易陷入殖民論述中常見的二分法困境，並且有簡化與合理化殖民者的殖民措施，並且克服對殖民脈絡與歷史脈絡的缺失，以尋求對殖民經驗與殖民的治理性能有更多的解析，本文以英國殖民印度與斯里蘭卡為例，以地緣政治、族群、宗教、空間、語言、階級、全球化資本主義等因素，採取「多元衝突分析」，釐清英國所採取的殖民政策，以及印度與斯里蘭卡在殖民前與獨立後的社會文化特性。透過「多元衝突分析」可以發現，這些因素原本就是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歷程。不能將這個歷程中，有任何不符合西方發展模式的情況，或衝突的既存現實歸因於殖民主義。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分而治之」與「雙重使命」的分析策略，相較於「多元衝突分析」，確實可以涵蓋更多的推論範圍，卻因為歷史脈絡的缺乏，使得結論容易流為泛論或意識形態的宣稱。相對的，「多元衝突分析」是透過個案的深入分析中，獲得有限推論的結論，但透過累積不同個案以及個案之間的對比後，其結論的有效性便能逐漸提升。這也是許多學者逐漸將觀察脈絡與議題轉向日常生活層面的殖民經驗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儘管「殖民是否為一套精緻的治理性」的問題仍存在爭議，隨著研究逐漸深入日常生活層面考量殖民經驗與歷史脈絡，以「多元衝突分析」的概念，並透過治理性呈現在歷史脈絡下文化與政治的複雜關係，有可能為殖民議題呈現更為豐富的研究成果。

* * *

Multiconflict Analysis of India-Pakistan, Sinhala-Tamil, and Rethinking Analytic Methods

Yu-chuan Chang

Lecturer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Taiwan Hospitality & Tourism College

Abstract

Of colonial topics, a lot of scholars indicate that colonizers exploited the opposition in different races and enforced the tactics of *Divide-and-Rule* for the colonial purposes. Another school of scholars, based on the *Dual Mandate* approach, indicates that colonizers not just destroy but construct the colony as well. The article considers two approaches that led to the dilemma of colonial discourses especially on dichotomy - *Divide-and-Rule*, which leads to either colonizers controll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nflicts between ethicities, or conceding the powerless with conflicts between ethnicities and *Dual Mandate*, which rationalizes the colonial policy and neg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olonies. Therefore, the article queries the analytic frames of *Divide-and-Rule* and *Dual Mandate* in the colonial context, as whether the two approaches can explai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s and the governmentality of colonialism.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flict in India and Sri Lanka during the last phase of British colonization with multi-conflict analysis, including political geography, ethnicity, religion, space, language, class, and global capitalism. The article hopes to be a new start in the study of colonialism.

Keywords: Colonialism, India, Sri Lanka, Multiconflict Analyses, Divide-and-Rule, Dual Mandate

參 考 文 獻

- 王作印，「西方殖民主義雙重使命解讀——馬克思對英國侵略印度問題的分析追思」，
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第 23 卷第 3 期（2007 年 6 月），頁 31~34。
- 林承節，殖民主義史：南亞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412~414。
- 易玲，「印度 1980 年代的斯里蘭卡政策與泰米爾問題」，南亞研究季刊（四川），第
2006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93~99。
- 杭聰，「馬克思雙重使命論新探」，理論月刊，第 2009 卷第 2 期（2009 年 2 月），頁
12~15。
- 俞良早，「馬克思主義關於西方列強在東方殖民地雙重使命的理論」，社會科學研究，
第 2009 卷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74~79。
-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出版社，2003
年）。
- 時宏遠，「斯里蘭卡民族衝突的根源發展及前景」，南亞研究季刊（四川），第 2006 卷
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61~65。
- 陸梅，「從印度的變遷看英國殖民統治的雙重歷史使命」，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21 卷第 2 期（2005 年 6 月），頁 95~99。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83).
-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Armon, Jeremy and Liz Philipson eds., *Demanding Sacrifice: War and Negotiation in Sri
Lanka* (London: Conciliation Resources Lancaster House, 1999).
- Arnold, Davi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19th Century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Asad, Talal,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London: Ithaca Press, 1973).
- Carro, James P., *Constantine's Sword: The Church and the Jews-A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1).
- Callard, Keith, *Pakistan: A Political Stud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7).
- Chakrabarty, Dipesh, "Modernity and Ethnicity in India," in John McGuire, Peter D. Reeves
and Howard Brasted, eds., *Politics of Violence: From Ayodhya to Behrampada*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p. 207~218.
- Cohn, Bernard S.,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Cohn, Bernard S.,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ollier, Paul and Anke Hoeffler, "On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 Papers*, Vol. 50, No. 4 (Winter 1998), pp. 563~573.
- Daniel, Valentine E., *Charred Lullabies: Chapters in an Anthropology of Viol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arwin, John, *Britain and Decolonisation: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 War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88).
- Das Gupta, Jyotirindra, "Language Diversit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Fishman Ferguson and Das Gupta, eds., *Languag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Nations* (New York: Wiley, 1968), pp. 17~35.
- De Silva, K. M., "Ethnicity and Conflict in South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1 (Spring 2001), pp. 53~77.
- De Silva, K. M., Pensri Duke, Ellen S. Goldberg, and Nathan Katz eds., *Ethnic Conflict in Buddhist Societies: Sri Lanka, Thailand, Burma* (Colombo: Westview Press, 1988).
- Dell H. Hymes,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Vintage, 1974).
- Dewey, Clive, "Images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A Study in Anglo-Indian Thought,"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6, No. 3 (1972), pp. 291~328.
- Dirks, Nicholas B., "Colonial Histories and Native Informants: Biography of an Archive," in van deer Veer, ed.,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3).
- Dirks, Nicholas B., "Ritual and Resistance: Subversion as a Social Fact," in Nicholas B. Dirks et al., eds., *Culture/Power/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83~503.
- Dirks, Nicholas B., "Annals of the Archive: Ethnographic Notes on the Sources of History," in B. K. Axel, ed. *From the Margin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Futur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32.
- Dirlik, Arif, "Rethinking Colonialism: Globaliz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Nation,"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4, No. 3 (Fall 2002), pp. 428~448.
- Dumont, Louis,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trans. by Mark Sainsbury, Louis Dumont, and Basia Gulat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by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Grove Perss, 1967).
- Fishman, Joshua A. and Frank R. Solano, "Cross-Polity Perspective on the Importance of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as a 'Contributory Factor' in Civil Strife," *Canadian Revie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 Vol. 17, No. 1-2 (1990), pp. 131~146.
- Foucault, Michel, "Governmentality," in G. Burchell, C. Gordon, and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1), pp. 87~104.
- Gough, Kathleen, "Anthropology: Child of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19, No. 11 (1968), pp. 12~27.
- Guha, Ranajit,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Hacking, Ian,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Inglehart, Ronald F. and Margaret Woodward, "Language Conflicts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0, No. 1 (Spring 1967), pp. 27~45.
- Joardar, Biswanath, *Anthropology in the Making: The Indian Experience* (New Delhi: Inter-India, 2003).
- Kapferer, Bruce, *Legends of People, Myths of State: Violence, Intoleran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ri Lanka and Australia*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8).
- Kashyap, Anand, *Anthropology of Indian Tradition* (New Delhi: Vedams eBooks, 1995).
- Kennedy, Chris ed.,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duc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3).
- Krishna, Sankaran, *Postcolonial Insecurities: India, Sri Lanka,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hoo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 Laitin, David D., "Language Conflict and Violence or the Straw that Strengthened the Camel's Back," Presented for Language Conflict and Violence (Madrid: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uan March Institute, April 15, 1999).
- Luhrmann, T., *The Good Parsi: The Fate of a Colonial Elite in a Postcolonial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angan, James A., *The Games Ethic and Imperialism: Aspects of the Diffusion of an Ideal* (New York: Viking, 1986).
- Manogaran, Chelvadurai and Bryan Pfaffenberger, *The Sri Lankan Tamil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Colombo: Westview Press, 1994).
- Marx, Karl,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New York: New York Daily Tribune, 1853).
- Marx, Karl,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T. Bottomore and M. Rubel, eds. (London: Penguin, 1961).
- Mathur, Saloni,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South Asia Rethinking the Archiv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9 (Spring 2000), pp. 89~106.
- Mehta, Pratap Bhanu,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acific Affairs*, Vol. 71, No. 3 (Fall 1998), pp. 377~396.
- Metcalf, Barbara D. and Thomas R. Metcalf, *A Concise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Mitra, Subrata K., "War and Peace in South Asia a Revisionist View of India-Pakistan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 10, No. 3 (Fall 2001), pp. 361~379.
- Mitra, Subrata K. and Dietmar Rothermund eds.,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Manohar, 1997).
- Noyes, Jonh K., *Colonial Space. Spatiality in the Discourse of German South West Africa, 1884-1914* (Chur, Reading: Harwood, 1992).
- O'Barr, W.,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Policy in Tanzania: An Overview," in W. O'Barr and J. O'Barr, eds., *Language and Politics* (The Hague: Mouton, 1976), pp. 35~48.
- Obeyesekere, Gananath,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Sri Lanka," *Internationales Asienforum*, Vol. 15, No. 1-2 (Summer 1984), pp. 39~60.
- Pandey, Gyandendra e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alism in Colonial North Ind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Peebles, Patrick, "Coloniz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the Dry Zone of Sri Lank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1 (Spring 1990), pp. 30~59.
- Pels, Peter, "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Governmentality," *Annual Review Anthropology*, Vol. 26 (Spring 1997), pp. 163~183.
- Pels, Peter and Oscar Salemink eds., "Five Theses on Ethnography as Colonial Practic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VIII, 1-4 (1994), pp. 1~34.
- Perera, Nihal, *Society and Space: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Postcolonial Identity in Sri Lanka* (Colombo: Westview Press, 1998).
- Rahula, Walpola, *The Heritage of the Bhikku: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hikkhu in Educational,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4).
- Richardson, J. N. and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Measur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Sri Lanka's Ethnic Conflicts," in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and Reid Coughlin, eds., *Economic Dimensions of Ethnic Conflict* (London: Francis Pinter, 1991), pp. 194~223.
- Richter, Linda K., *The Politics of Tourism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 Schumaker, Lynette, "A Tent With a View: Colonial Officers,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eld in Northern Rhodesia, 1937-1960," *Osiris*, No. 11 (1996), pp. 237~259.
- Shih, Cheng-Feng, "The Emergence of Basque Nationalism in Spain: An Examination of Some Explanatory Variables,"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Fall 1995), pp. 141~166.
- Siddiqi, S., "Chemistry," in M. M. Sharif, ed., *A History of Muslim Philosophy*, Vol. 2 (Otto

-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6).
- Skutnabb-Kangas, T. and R. Phillipson,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Past and Present," in T. Skutnabb-Kangas and R. Phillipson, eds.,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Overcoming Linguistic Discrimin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4), pp. 71~110.
- Smith, Wilfred C., *Islam in Modern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Somasundaram, Daya, *Scarred Minds: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War on Sri Lankan Tamil* (New Delhi: Sage, 1998).
- Spencer, Jonathan, *A Sinhala Village In a Time of Trouble: Politics and Change in Rural Sri Lanka* (New Delhi: Oxford India Paperbacks, 1990).
- Stocking, George W., *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 Stoler, Ann L., "In cold blood: Hierarchies of Credi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 Narratives," *Representations*, Vol. 37 (1992), pp. 151~189.
- Stoler, Ann L., *Race and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Tambiah, Stanley J., *Sri Lanka: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 Tambiah, Stanley J., *Buddhism Betrayed?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Sri Lank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Tambiah, Stanley J.,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Taussig, Michael, *The Nervous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Thomas, Nicholas,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 Van der Veer, Peter, *Religious Na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Vaughan, Megan, *Curing their Ills: 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 Wallerstein, Immanuel,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 White, Nicholas J., *British Business in Post-Colonial Malaysia, 1957-70 Neo-Colonialism or Disengag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 Wickremaratne, Ananda,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Sri Lanka* (Colombo: Karunaratne and Sons, 1995).
- Wilson, A. Jeyaratnam, *The Break-Up of Sri Lanka: The Sinhalese-Tamil Conflic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 Wilson, A. Jeyaratnam, *Sri Lanka Tamil Nationalism: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Vancouver: UBC Press, 1999).
- Winslow, Deborah and Michael D. Woost, *Economy Culture and Civil War in Sri Lank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